

红色家族



张秀章 李刚◎著

四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家族

(四)

张秀章 李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三十二 别战友历艰辛投奔延安 领新命苦辗转敦蒋抗战

回到市里，李智先到饽饽坊8号，结果又碰锁，只好跑到八大胡同49号。

这是一个正房、两个厢房的四合院。一个厢房是厨房，另一个厢房有三间书房。女主人赵元珠将他领到左手那间大屋里，只见书房里配有红木大理石家具，紫檀的书架和长几，布置得古朴典雅。书架上排列着不少古典书籍，几上摆满佛教经典。

“呀，看这书房，这家主人倒象是超脱红尘、不问世事的修行者呢！”李智顺口发表观感。

“这是你哥哥他们让我这样布置的。”

“哎，元珠，我哥呢？”

“去灯市口北震宫旅社，看望俞老太太去了。”

“俞老太太？”

“黄敬的老母。”

“那我要到‘八舅家’（八路军根据地，这里指延安）念书，找谁呢？”

“怎么，你接到招生广告了？”

“在游击队看到了。”

“好，你等下，我看看李大哥在不。”

城委书记姜平同志的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隔壁书房里。“李大哥”即是他的化名。

“啊，是李智呀！”姜平进了这间屋就热情询问：“平西方面怎样？”

李智简单汇报后，说：“我想去延安‘抗大’。”

“怕最近走不成，刚刚送走一批，就得等一等，起码还得两个月。”

“那能赶上开学吗？”

“没关系，随时可以入学的，不过你要着急，也可以自己先走，直接西行恐怕不行，交通已断，而且国民党封锁的厉害，只能绕行，从南方经武汉北上。”

“那你给我开个介绍信吧。”

“我介绍倒可以，不过路上不安全，莫如到武汉办事处来得直接，而且有人护送，比较稳妥。

“就这么办啦！请告诉我延祐哥一声，我走了。”

“怎么说走就走？”

“我心急如焚呢。”

“好吧，保重！”

回到公寓，李智很上火，说得轻巧，可路费还没有着落。

这天饭后，他在院内散步，和公寓住的辅仁大学学生于浚涛唠起来。

“浚涛，你是哪儿的人？”

“怎么还听不出我的东北口音吗？我是哈尔滨人。”

“哎呀，咱们还是同乡啊！”

“可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去年。”李智见问，因对他不了解，只好打埋伏说：“流亡关内还不是想求学，如今学也念不成了。你还行吧？”

“行什么呀，学生都到南边去了，说念什么‘联大’，我是不想再念了，倒想到南方走一走。哎，真的，李智你跟我一起走吧，还是个伴。”

李智一听，真是喜从天降，便说：“可惜，我没钱哪。”

“没问题，我家刚刚邮来六七十元，满够用了，咱先从天津坐船经香港，绕道到广州，连吃饭带坐船才20来元。”

“那可要谢谢你了。”

“谢啥，谁叫咱是老乡呢。说走就走，明天怎样？”

“行。”

第二天，他们坐上早班北平开往山海关的火车。车经过廊坊车站，看到月台上站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李智打了一个寒噤，自言自语：“这哪里还像中国自己的国土啊！简直就是‘满州国’啦！”

到了天津，当天没能买到船票，需要住下。李智对于浚涛说：“咱就住在日本驻军对面的那家公寓里。”

“那不没事找事吗？”

“没关系的，你看我的！”

这公寓里住着不少从东北来的日本人，李智洗漱完毕，就与他们闲扯，还操着日本话与他们打了两圈牌。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到公寓里查夜，误认为李智也是日本人，客客气气地问了两句，便未再来打扰。

通过公寓，买到了次日中午天津到香港的英籍太古货轮三等舱位。

进码头，李智用日语和宪兵打招呼：“辛苦了！”

“携带什么？”

“行李、衬衣。”

很顺利地登上了货轮。

经过四五天的颠簸，终于到了香港，上了岸住在码头的一家旅馆里。

“李智啊，我不想走了，你一个人走吧，我买票就是了，这里有15块钱，你拿着。”于浚涛说。

“有票就行了，还给什么钱！”

“那不行，我约你出来的，送佛得送到西天，何况你又没钱。不要不好意思，我们是同乡嘛！”

“那我就只好说什么了，咱们后会有期！”

第二天，于浚涛把李智送到码头，交给他一张通票。这样，李智就搭轮渡经九龙转乘火车抵达广州。下了车费了好大劲儿才买到通往汉口的车票。

车上，这人多得都堆起来了！车门上挂着人，窗口也扒着人，行李架上也横躺竖卧着一些人，就连厕所的马桶座位上也都挤坐着人，车内闷热得喘不过气来。车棚上净是哈气，可有什么办法，战乱年代就是这个样子嘛！

车到长沙站，李智挤下车到月台上想买点吃的，无意中遇到西安学兵队一连的几个同学。

“喂，你们这是上哪儿？”

“我们是刚从武汉来，要到农村去，做农运工作。你呢？”

“我是由北平绕到这的，准备上延安。”

“嚯，这下咱可是南辕北辙了。对了，到陕北去，得先去汉口找刘官。”

“刘官？”

“对，大官的官，他住在民生路民生旅社，由他帮你介绍！”

正在这时，火车鸣笛，李智光顾和同学谈话，要买的东西还没买呢，犹豫一下，就急忙返身往车上跑。几个同学觉察到李智

的心思，一边在下边推他，往门里挤，一边把一包饼干和一小网篮的水果塞过去。

“接着，李智——祝你一路顺风——”

李智来不及道谢，车门便“叭”地关上，随即列车启动了。

到武昌下车已很晚，只好先找个小店住下。

第二天过江。呀！这武汉真像开了锅。不光是气候热得让人“捂汗”，那政治空气也是沸沸腾腾。

满耳是南腔北调，喧哗得听不出个数。原来，平、津、京、沪和沿海一带的流亡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一时间都涌到了这里。街头上，码头上、轮渡上到处可见宣传、募捐等活动。眼见这情景，李智又激动起来，不禁想起“一二·九”、“一二·一六”、“西安事变”及“卢沟桥事变”时种种动人的场面。“是啊，全民的抗战终于来了！”他心中感慨道。

按照学兵同学提供的地址，李智很快就找到了刘官。

刘官听了情况后，热情地说：“明天早上来，咱们一起到办事处去！”

次日，又过江，来到汉口交通大旅社，正巧在楼梯口碰见刘澜波同志。

“是李智吧，我知道，学兵队宣传员的好手呢！走，上楼谈话去。”

上了楼，刘澜波忙询问道：“你二哥好吗？”

“我走时，他还在北平。”

“见到你大哥了吗？”

“没有什么音信。还是1934年6月他到上海找临时中央回来时，在北平见上一面，也不知后来怎样？真叫人惦念。”

刘澜波隔窗望窗外街上沸腾的场面后，车转身对李智道：“这么说，你还真不知道李延禄的情况了？”

“是的，不知道。也不知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真叫人放心不下。”李智忧心忡忡地叨咕着。

“放心好了，他早已调到华东局搞统战工作哩，连林平也在上海。”

“林平？”

“就是你的侄女李万新。”

“哎呀，想起来了，就在我去西安学兵队的同时，二哥让我通知她去上海，却不知我大哥去了那里。他们父女总算团圆了！”

可李智纳闷儿，怎么会搞起统战工作呢？什么时候去的呢？……

自从北月牙胡同4号哥俩分手后，李延禄返回上海，他装成一艘英籍轮船上的水手，随船到了海参崴。7月的一天晚上，他钻进靠近苏联国境的一个小山村，回到抗联的营地。面对日军的攻势，辗转战斗，分散游击，继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其间，一团团长杨太和壮烈牺牲，吉东特委组织部长孟泾清也被捕遇害。

1935年底，李延平回国，中央命李延禄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到。离职期间，四军军长一职由李延平代理，并兼军政委。4月1日，李延禄眼含热泪，告别了松花江两岸英勇不屈的英雄儿女们，经由海参崴赴莫斯科。

首先是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为他选派了一名文化素养较高，适合从事敌后工作，从未暴露过身分的人做他的秘书。

这个人就是孙西林。他也是东北人，辽宁省昌图八面城的。早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赴比利时留学，又转去法国从事工人运动。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8月受第三国际中国支部派遣，与邱华锋、张亦华、周易四人来到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组织考虑到中国同志将来回国后的安全，通知他改名字，并要注意回避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人员。于是孙西林同志化名孙山。先被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个出版社，行政上由苏共中央直接领导，业务上则由第三国际负责。孙西林在这里先后做过校对、排版、抄写等项具体工作。

1935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二年的4月，李延禄入校后，便将他派来做秘书工作。

为了加强全国的抗日舆论宣传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经组织批准，孙西林和原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

书成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决定，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3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

1936年9月，李延禄、潘汉年、孙西林从莫斯科启程，乘车到巴黎。

路上，李延禄对潘汉年说：“你的谈判经验很丰富，凡事你要多出头。”

潘汉年谦虚地说：“经验丰富谈不上，不过是多接触过上层一些人。咱们这次主要是对东北军张学良进行联合抗日反蒋工作，多向大家讲一讲东北人民和东北抗联情况，因此你是关键人物。”

“两位不要谦让了，依我看，咱应各司其职，有个大体的分工。汉年同志多做些联络比较合适；延禄同志呢，集中搞些抗联方面的宣传；我，不用说，是二位的秘书，抄抄写写，跑腿学舌，全包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孙西林三下五除二，把工都分了。

李延禄接言道：

“我看西林说得不错，就这么着吧。不过西林的名字还得改一改，改什么好呢？”

“随便改个啥都行，”孙西林略加思索，“就叫孙昌克吧。”

10月间，经马赛乘船到达香港。代表团在香港和救国会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鼎，李宗仁在香港的代表人物王公度、刘中容、黄皓明，以及梅龚彬、钱铁如、柯灵，叶挺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李延禄1934年化装进关找党中央时曾来过香港进行抗日宣传和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而今他的到来，倍受香港同胞的欢迎，特意为他组织了两场东北抗联斗争报告会。

此间，潘汉年派人去上海打听地下党的消息，以便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同时写信给陈果夫，要他派人到香港商量两党谈判。

陈果夫随即派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到香港与代表团联系。

11月1日代表团在张冲陪同下，抵达上海。按照党的指示，他们首先通过李杜将军的秘书董麟阁的帮助，与上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取得联系。

第2天，李延禄、孙昌克在沧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仆、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说明此行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旨意，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表示愿作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上海通过救国会的茅盾找到了党中央派

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并从冯处找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以及西安到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还见到了刚到上海的中央代表刘鼎同志。刘向潘讲述了共产党与张学良秘密联络的经过，提出潘可去西安直抵七贤庄牙医诊所去找与史沫特莱、宋庆龄有关系的外国革命者兰道牙。

经商量，李延禄同意潘汉年只身前往。潘到了西安，住七贤庄，通过兰道牙去保安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毛泽东电示潘汉年：“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即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请张学良“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达成谅解”。同时要求潘汉年接电后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谈判方针”，并取亲笔信。

11月9日，潘汉年返回上海当天上午，与李延禄、孙昌克一行三人，在马斯南路拜见宋庆龄与何香凝，向她们阐明了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信，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

同日下午，代表团在李杜的秘书长刘丕光陪同下赴南京。

晚上，李延禄在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光召集的军政部和参谋部有关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汇报了东北抗联的情况，并递交了“请愿书”，提出六项具体要求：

一、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团结全国各党、各民族、各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一致对外抗战；

二、收复东北失地；

三、援助东北抗日联军；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放抗日运动和抗日言论；

六、东北抗日联军应有代表团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刘光看过六项要求后，说：“你们提的问题都很大，鄙人无

权答复，这得军委开会研究后方能定夺。”不过他倒给出了个主意：“你不妨再返回上海跟陈果夫先谈谈。”

3人代表团认为也只有这样。李延禄对孙昌克说：“西林，你快去电报局，给李杜发电，请他快些回国，共商救国大计，他是主管东北抗日事务的嘛！另外再给张学良、宋哲元、冯玉祥发电说明东北抗联代表团此行南京的意图及请愿的要求，请予以支持。你发完报无论早晚，今晚赶回上海，我和汉年先行一步。”

11月10日，由张冲约定，李延禄、潘汉年、孙昌克与陈立夫（因陈果夫患病，由陈立夫代替）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潘汉年将保安携带回来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以及由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递交给了陈立夫。

潘汉年依照毛泽东“谈判方针”，陈述了共方关于谈判合作条件：“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和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陈立夫原本是想应付一下，他认为这还不能算作两党的高层会谈，尽管李延禄在开场白中声称他们3人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并取得中共中央全权最高代表权，但，他还是没怎么看得起，所以开始听潘汉年陈述时似听未听，心不在焉，可是听着听着不禁惊叹：这滔滔不绝流畅的口才；这如刀锋一样犀利的词句；这入木三分、鲜明准确不容置疑的观点……实在让人不可小觑！于是，他调整一下自己的坐态，现出诚恳的面容，专注地听下去：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召开抗

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决非是代表团哪个人的意见，确实是代表着共产党的最高当局，况且句句都没有离开《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精神。陈立夫听后，在内心产生如此结论。他笑了笑说：“从你们提供的文件和陈述可见是有诚意的，对此我表示满意。对贵党起草的‘协定’鄙人代表蒋介石先生只提出如下两点意见：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目前红军可保留 3000 人之军队；二、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都可按才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幸亏只是这两点，这要是更多还真让人望而生畏呢！”李延禄止不住地嘲讽了一句。

可陈立夫却不在意，反而煞有介事地说：“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谈政治观点都好办，好办。”

潘汉年指出要害：“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接着，他据理提出质疑：“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经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抵抗之心，未知从何做起？”

陈立夫面对这义正辞严的责问，一时显得非常难堪，他深知自己绝非对方的敌手，便施了一个离间小计：“李先生，你是抗日将领，想来想必有更为切实的高见，能否说说，我好向军委会蒋先生面陈。”

李延禄一眼看穿他的把戏，但却不露声色地说：“你太抬举我了，要说高见，我同潘汉年是一致的，他之所言，正是我心中之语，就不必再重复了。还是请陈先生予以妥切的答复。”

陈立夫摆弄了一下谈判桌上茶杯上的杯盖，望了望面前的3个气宇昂扬的代表，只好调转话题说：“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你们同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

“这个不难，”潘汉年指出，“不过在激烈交战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会出来的！”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但却得到李杜在法国的复电，表示同意尽快回国。同时，接到宋哲元、张学良、冯玉祥打来的支持电。

潘汉年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除了与宋子文、陈立夫、张冲等接洽，进行国民党上层社会的活动外，还与冯雪峰、夏衍进一步取得联系，通过他们与上海地下党发生关系，并与宋庆龄经常联络，通过她将有关情报传到国际方面去，部分地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事务关系。

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积极活动，不仅得到各党派的支持，还博得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一时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促蒋抗日的强大压力。这对日蒋的“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为此，蒋介石的日本顾问冈村宁茨特向蒋提出抗议。

11月22日，上海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营救“七君子”，代表团以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代表团还派孙昌克携李延禄的慰问信及食品到苏州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

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过程中，12

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引起了各阶层的轰动，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忧心忡忡。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时局将怎样发展？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这些重大问题。

林平（李万新）从“双十二事变”的《号外》中知道蒋介石已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在西安的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兴奋啊！她溜烟地跑到霞飞路新华公寓李延禄的住处去报告喜讯。

一进门，就见父亲同孙昌克也正热烈地谈论此事。李延禄见万新满围巾上的白霜，再见那通红的脸，知道她是异常兴奋奔跑而来，便说：“快把围巾摘下来赶赶寒气，坐在沙发上歇会儿，我们还有几句话要谈，你听着就是了。”然后他继续对站在窗前的孙昌克说：“你也过来坐嘛，你不是总盼着万新来吗？她来了，你却这么呆板，热情点嘛！”

“我可不用他热情，这里又不是他家！”林平笑嘻嘻地说。

原来，李延禄、孙西林他们到上海不久，李万新化名林平，在她大叔李常青安排下也来到上海。

孙昌克不知怎么的，对这位小妹妹格外关心。每逢相遇，他总是主动热情地向林平介绍许多国外新闻及时局发展的形势，并拿《巴黎救国时报》给她看。两人倒也是一见如故，坦城相见，经常就时局的发展开展讨论。孙西林在法国从事学运、工运多年，到苏联去又集中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虽然年仅26岁，却在政治思想及知识视野方面都比一般青年成熟开阔得多。林平对他的许多观点都感到非常新颖，对他的敏捷的思维与配合父亲工作时的忘我精神也很佩服。渐渐两人间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总想见面的微妙感情，当然，这一切是瞒不过李延禄的眼睛的。

林平见孙西林也坐到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来，便说：“你们谈什么呀，不保密吧？”

“你先听，别插嘴，等会儿我再问你的观点。”李延禄对女儿说。

“怎么，我是多嘴婆吗？这么不放心，我不吱声就是了！”李万新就是这样得理不让人。

爸爸知道女儿的脾气，不理她就是了，他继续与孙昌克谈话。

“党中央现在什么态度还不十分清楚，我们也还没有接到什么指示。”孙昌克汇报说。

“你让潘汉年通过地下电台尽快联系，现在已由促蒋发展到逼蒋了，我们一定把握这绝对时机，万万不可错过。”李延禄指示道。

“怎么，难道还要他姓蒋的活命吗？这个卖国贼把东北害苦了，把华北害苦了，是他使得我们蒙受奇耻大辱，是他使国土倍遭涂炭，不杀蒋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洗耻雪恨！”林平情不自禁地插言了，她把满腔愤怒都一古脑儿地倾泄到蒋介石身上，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最后像下结论似的说：“杀，立即枪毙！”

孙昌克对这个经历“一二·九”运动洗礼的青年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许，同时也看到林平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单纯和幼稚。为了让林平冷静一点儿，他有意压低嗓音说：“张、杨扣蒋这叫‘兵谏’，其目的不外乎是逼蒋抗日。对蒋介石如何处置，要权衡利害，也许不杀蒋更有利呢。不能感情用事啊！”

“什么？感情用事！”林平简直被激怒了，几乎委屈得要哭起来，她厉声喊道：“你孙西林不主张杀蒋就是对祖国、对东北人民的背叛！说我感情用事，我看你倒是没有民族感情，你的立场

已……”

李延禄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偏激，便从旁说道：“万新，怎么搞的嘛！西林的本意是让你能全面分析问题，认识问题，你怎么进行人身攻击呢？对问题的研究与争论可以各持己见嘛！”

林平也知道自己不冷静，但她还是愤愤地不服气，噘着一张小嘴坐在那里揪围巾边头上的毛线。

一天，潘汉年急匆匆地来到新华公寓，对李延禄和孙昌克说：“党中央已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去西安与张、杨会谈去了，并电告我们东北代表团要领会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我们：‘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以及最低限度条件；同时让我们配合中央做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的工作’。”

一方面，潘汉年根据党中央指示与代表团的安排，很快和张冲联系，并通过宋庆龄转告宋子文：我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与张、杨面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方面，代表团由孙昌克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二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的，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救国大业。

经过共产党的努力，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终于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八项协议”，打开了全国不分党派、民族、信仰、团体，立即实行全面对日抗战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杀掉蒋介石，嫁祸于共产党，从而制造更大规模的全国内战的反动阴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林平才意识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能力与孙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从此，她不但改变了认为孙西林主观自信的看法，还对他产生了由衷地信任、敬佩和爱慕之情。